

释,而非“从逻辑上”使其声名扫地。与阿维泽·塔克尔(Aviezer Tucker)一样,我仍然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学科合理性之核心。我的确同样认为,这种合理性的核心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东西。^①但是正如奎因教导我们的那样,人类对于现实的所有理解都是这样的情形。^②

有了这些新的好迹象,我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寻求一种调和——既是为开启实际自然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向度,也是为给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恢复某种学科合法性的意义,以反对那种在我看来是对其在语言学上的消解所做的夸张的、后现代的描述。如果我们首先丢弃那种关于科学必须是什么的实证主义幻觉,还有那种语言绝不可能表述具有主体间性的洞见(即经验性的指涉)的后现代主义错觉,我们便可以转向历史研究能为何物的问题,并且将有关史学实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带回到一个理智的语境之中。

(本文译者陈栋,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进兴

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自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竟达数千年之久。^③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自20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④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⑤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相互辉映。^⑥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⑦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

①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② 奎因对这个未决性的论题最清楚的表述是在“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 *Erkenntnis*, vol. 9, 1975, pp. 313-328.

③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p. 138-139. 另可参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章,第2页。

④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第2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第1—32页。

⑤ 梁氏完备成熟的论述则见诸《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二者均收入《饮冰室专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

⑥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该书出版于1912年,收集作者自1900年以来所发表的文章。首篇的标题便是《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发表于1900年。该书在20世纪初期影响并带动美国的历史研究甚巨。请参见黄进兴:《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Beard)和贝克(Becker)谈起》,《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125页。

⑦ 在1890年代,西方学界即倡议开创一种别出心裁的“新史学”(New History),与以兰克史学为首的传统史学相区别。主要代表在德国有关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法国则有贝尔(Henri Berr),美国则有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等,不过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参见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 20 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 21 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① 在中国，“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击。

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属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王国维指出：“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② 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③ 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④ 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⑤ 便获得不少的回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⑥ 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⑦ 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

① 2007, pp. 313-318. 又“新史学”一词，当时在史学界应相当流行。经查，傅斯年私人藏书中有 Gustav Wolf,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Geschichte*,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10. “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

① Maria Lucia G. Pallares-Burke, *The New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1990 年代，在台湾即有一群青年学者创办《新史学》，以求开风气之先，开拓史学研究的新视野。

② 王国维：《重刻〈支那通史〉序》，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 4 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69 页。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 4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年，第 253 页。

④ 近年研究“民族”的形成偏向主观论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⑤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⑥ 梁氏“新史学”的来源，显然有取自当时日本引介的西方史学，但也有径取西方史学的地方。但正本溯源，西方史学方是其最终源头，因为当时日本史学亦是取资西方。参见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1 本第 2 分，1980 年，第 315—323 页。又参见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代序言）》，收入邬国义编校，浮田和民讲述：《史学通论四种合刊》，李浩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49 页。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第 1 册，第 360 页。

“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①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②

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评断。柳诒征说：“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③便是明证。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

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职是，特别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④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⑤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⑥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具有同等的份量，均代表兰克史学于世纪之际的再兴。^⑦此外，受业于胡适、复为兰克史学的践行者傅斯年，^⑧更直截了当地宣称：“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⑨他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

① 史料的分辨在中西传统史学均相当模糊，但在西方17世纪以下则获得前所未有的厘清，最终变成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1-39.

② 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trans. Sarah Austi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1905, p. xi.

③ 柳诒征：《国史要义》第3编，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61册，第110页。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19页。

⑤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5页。

⑥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3页。《史学原论》法文原版出版于1897年，英译本发行于1912年。Charles Victor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trans. G. G. Berr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Duckworth; New York: H. Holt & Co., 1912.

⑦ 19、20世纪之交，西方广受欢迎且最具分量的两本史学方法巨著，其一为德国史家伯伦汉于1889年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其二为法国史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于1897年合著刊行的《史学原论》。二书绍述兰克史学，并予以发扬光大。

⑧ 傅斯年固然直接提到兰克（他谓之“软克”）之处不多，但其史学主张，就内容分析，却与盛行于世纪之际的兰克史学相当类似。经查“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书，攸关傅斯年私人藏书则赫然可见集兰克史学大成的伯伦汉的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按：该书为伯伦汉前述经典的流行简本），遑论复藏有其他为数不少论及兰克的史学史与史学专著，他对兰克史学想必相当熟稔。按：兰克极少关于史学本身的论述，有则见诸专史的序言。傅斯年图书馆早年藏有不少兰克的德文原著，应与傅斯年有关。

⑨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他又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6页）傅氏主张染有兰克史学的色彩。请

学。”换言之，“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① 傅氏对“史料”极端重视，毋怪后人径以“史料学派”标示他所领导的“史语所”。^②

世纪之交，梁氏等诸贤敞开胸怀，迎纳西方史学，不料却让自身陷中、外史学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传统史学固不敷应付世变日亟的时局，而必须引进西方史学，然而后者复逢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的挑战，窘态乍露。^③ 故梁氏乃不得已移樽就教，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④ 决心将中国史学带离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之学，正式加盟西学阵营。

早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便批评中国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⑤ 他认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有“间接关系”的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与傅斯年同为兰克史学代言人的姚从吾，也认识到其他科学对历史研究的益处，他说：“觉 Ranke 及 Bernheim 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⑥ 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相当普遍，举其例，清代的章学诚在民初获得极高评价，备受中外名家诸如日人内藤湖南、胡适等所推崇，但吕思勉于比较章学诚与今日史家的异同时如是评道：

他（指章学诚——引者注）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⑦

依吕氏之见，章学诚的史学造诣与现代史学所差无几；唯现代史学的进步乃拜别种科学之赐。^⑧ 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⑨

简言之，踵继梁氏而起的新史学，大致遵循“史料优先”及“以客（社会科学）为尊”的两大方向发展。前者固可强化传统学术，尚不致威胁正规的历史研究；然而迎门接纳代表西学的社会科学，却是地道的“城下之盟”，极大斫伤了史学的自主性。试举倡导以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治史的比克霍福为例，他便明确主张：“人作为分析的单元，只能透过某些概念架构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类行为的知识，其他史学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⑩ 观此，史学遂仿若失去半壁江山，只得拱手让出解释权，沦为资料整理的工具罢了。

① 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35—144、246—253页。

②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5页。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章。当然今日的“中研院”史语所，气象更新，研究多元，不可同日而语。

④ 请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收入《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217—255页。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51页。

⑥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10页。

⑦ 王德毅编著：《姚从吾先生年谱》，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0—21页。要之，兰克史学善用“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帮助史学的研究，但着眼仅是工具性（例如语文学、金石学等）；不若20世纪新兴的“社会科学”往往喧宾夺主，视史学为史料学，而“社会科学”方是主导解释的理论。

⑧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第24—25页。

⑨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第24—25页。

⑩ 吕思勉著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1941）一文，参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25页。

⑪ Robert F. Berkhofer, J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 5.

20世纪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堪以道尽其中原委。中国史学结盟社会科学，不意令自身陷入西学的轮回而无法自拔。鉴诸台湾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行为科学，^① 在在证明所言不差。然而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这段时间内突然弊病丛出，危机重重；^② 其反思的结果，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出。这对恹恹惶惶的中国新史学而言，不啻雪上加霜。1980年代之后，两岸骤然必须同时面对西潮崭新一波的冲击，此无他，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来临。简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不一，最早见诸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文学与建筑评论，60年代方在哲学与思想园地发荣滋长，70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史学则殿其后，方受波及；而中国史学则尤在其后。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或取代“现代主义”（modernism），而中外“新史学”恰是“现代性”（modernity）所孕育的智识产物，遂成为其所攻讦的对象。后现代史学的追随者动辄大放厥词：“历史乃是西方的神话。”^③ 或者放声喧嚷：“历史的死亡。”^④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所谓的“历史”，意指一切非经由后现代程序所制造出来的史著。

后现代史家采取的正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态势。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于1969年刊行《知识考古学》，该时的书评者立谓“敲响了历史的丧钟”，^⑤ 似乎语不惊人誓不休。这对正规史家而言，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纵使他们刻意排斥或回避后现代主义的挑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业已充斥坊间的历史写作。举其例：“文本”（text，巴尔特）取代了“作品”（work），“论述”（话语）（discourse，福柯）取代了“解释”（explanation），“空间”（space）取代了“时间”，“间断性”（discontinuity）取代了“连续性”（continuity），“解构”（deconstruction，德里达）取代了“结构”（structure），“修辞”（rhetoric，怀特）取代了“论证”（argument），“书写”（writing，德里达）取代了“阐释”（interpretation），诸如此类，俯拾即是。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无远弗届。

尤有过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正面的冲击，仍然有二：其一，解消“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其二，“语言的转向”。^⑥ 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厘定“后现代”乃是对“后设叙述”的质疑；^⑦ 其界义适可运用到史学领域。“后设叙述”，在史学上又可谓之“大叙述”（grand

① 台湾六七十年代攸关行为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讨论，请参见该时的《食货月刊》（1971—1988，在台湾复刊）与《思与言》（1963年创刊）。

② 典型的例子，《西方社会学即将面临的危机》。（Alvin W.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传统史家斯通（Stone）也挺身指出：当前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似乎濒临知识崩解的边缘，史家必得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20.

③ Vincent Descombe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 L. Scott-Fox and J. M. Har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10.

④ Niall Lucy, “The Death of History,” in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7, pp. 42-62.

⑤ François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rans.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vol. 2, p. 245.

⑥ 按：史学的语言转向和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两回事，实质内容亦甚有出入。“语言哲学”渐趋式微，乃为不争的事实。参见“Ten Years After” and “Twenty-Five Years After,” 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转向”另有思想的泉源，乃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

⑦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narrative), 诸如: 民族史观、进步史观、马克思史观等等。它们均难脱本质论 (essentialism) 或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m) 的色彩, 而具有线性发展与目的论的特征。^① 职是, 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的史学, 动辄推崇“小叙述”的“微观史学” (microhistory), “大叙述”则受到贬抑。^② 直接受冲撞的, 便是法国年鉴学派所鼓吹的“整体史” (total history) 了。在中国史领域, 前述杜赞奇力图从民族国家的神话“拯救历史”, 便与俞旦初所阐扬的爱国主义的民族史学, 形成鲜明的对比。^③ 而台湾史家沈松桥受此氛围启示, 解构了“黄帝”的民族神话, 则是这方面别开生面的代表作。^④ 换言之, 后现代史家强调分歧 (diversity) 与异质性 (heterogeneity); 遂将整体的大历史 (history), 裂解为多元分化的小历史 (histories)。

同时, “后现代史学”一反实证史学, 遂行了“语言的转向”。^⑤ 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观察, “语言的转向”促使史学进行一系列的回归, 从史实至语言、从语言至文本, 最后从文本至符号, 其结果则是将语言和经验完全隔绝。巴尔特就说: “事实无它, 仅是语言性的存在。”^⑥ 德里达亦附和道: “文本之外, 别无它物。”^⑦ 封闭的文本论, 令历史不再指涉过去; 而失去对外的指涉性, 历史变成自成一格的符号游戏。^⑧ 从解读的角度, 巴尔特“作者之死”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的观点,^⑨ 迥异于往昔阅读文本的取径, 令“读者”的诠释凌驾于“作者”与“作品”之上。无独有偶, 德里达的“解构”及“书写”概念, 进而摧毁了“史源中心观点”, 标榜独树一帜的历史进路。

上述观点如果落实至史学操作, 便是测试史料与历史解释的限度。倘纯依循读者观点, 师心自用似乎难以避免。试举近年中、西史学中喧腾一时的争论, 环绕《魏玛共和国的崩溃》^⑩ 和《怀柔远人》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1995) ^⑪ 两部著作的论辩, 便代表“现代”与“后现

①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 xxiii-xxiv.

② 对“基础论”或“本质论”的反驳, 参见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③ 卡洛·金兹堡的名著《奶酪与蛆虫: 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被认为是“小叙述”的范作。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New York, N. Y.: Penguin Books, 1982. 反讽的是, 金兹堡坚决反对后现代史学。他所遵行的却是法官判断的“证据典范” (evidence paradigm)。参见 Carlo Ginzburg, *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9.

④ 试比较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⑤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 1997年, 第1—77页。

⑥ 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40-69.

⑦ Roland Barthes,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p. 138.

⑧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Spivak,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8.

⑨ 参见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2-65; Andreas Huyssen, “The Search for Tradition: Avant-Garde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1970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1981, p. 35.

⑩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s*, pp. 49-55.

⑪ 《魏玛共和国的崩溃》系亚布拉罕 (David Abraham) 所著。书中运用数据, 由于不同于传统的观点, 疑窦甚多, 引起正统派史家的挞伐, 遂成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交锋之地。论战之炽烈甚至上了《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1984)。

⑫ 《怀柔远人》系何伟亚 (James L. Hevia) 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 在史料运用方面甚受传统史家质疑。

代”史学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策略，而后现代的解读似逃脱不了望文生义的指控。

“望文生义”，析言之，即是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所谓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①“过度诠释”肇自解释漫无准则，以致言人人殊，背离了语言“沟通”（communication）的基本宗旨。严格言之，上述两部著作连德里达所提示的“文本注疏”（commentary）和“批判阅读”（critical reading）的程序，都难以通过。^②推其极致，甚至有“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之虞！举例来说，刘禾在开发“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文化现象方面甚有建树，^③但她把帝国的实质冲突归诸语言诠释的问题，则未免不太相称（out of proportion）！她在解释中英《天津条约》的交涉时说道：

通过挖掘这个衍指符号诞生的轨迹，我们会看到语词的冲突绝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生死斗争，一边是日趋衰落的大清国，另一边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

谁拥有对“夷”这个汉字最后的诠释权，谁就可以踌躇满志地预言这个国家的未来。^④

观此，语言不止是“存有的殿堂”（the temple of being），并且变成“语言的牢房”（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⑤

攸关历史知识的性质，后现代史学系持“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立场。意即：史家旨在拟构历史，而非发现历史。“逝者已矣！”（What is past is past!），后人已无法再知晓真实的过去。所谓的“历史”也不过是人类心智当下意识的产物。毋怪怀特会借道“语艺学”（poetics），抛出“历史若文学”（history as literature）的论点。^⑥而历史既然允纳虚构，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遂成过眼云烟！不止西方后现代史学有此现象，^⑦连中国史亦受到此类观点的渗透。汉学名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 1989），^⑧固以叙事著称，驰骋于史料与想象之际，极尽文艺之能事。然而传统史家却拒之于千里之外，视该书仅与“小说”相埒，竟未得入列“历史小说”之林。^⑨总之，“文史不分”或者允纳“虚构性”（fictionality），皆是与历史的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大唱反调，更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大相径庭。^⑩况且，后现代史学祛除历史知识的指涉作

① 参见艾柯（Umberto Eco）等著，柯里尼编：《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章“过度诠释本文”，第53—80页。

② 参见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p. 158-159.

③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0.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第52页。

⑤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 3.

⑥ 关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代表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3章，第53—93页。

⑦ 例如戴维思（Natalie Davis）、夏玛（Simon Schama）的名作。

⑧ Jonathan D.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⑨ Bruce Mazlish,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1, no. 2, 1992, pp. 143-152.

⑩ “秉笔直书”的纪实精神尤为中国新史学所继承。参见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柳诒征《国史要义》（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西方近代史学则以兰克为典范。他的名言：“历史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Leopold von Ranke, “Preface to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用，不啻就瓦解了自身鉴古知今的功能；因此除了美学的意义，历史则变为无用处。^①

归根结蒂，后现代史学呈现有“语言迷恋”（linguistic obsession）^②或“文本崇拜”（the fetishism of text）的倾向。^③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着重符号或文本的“示意作用”（signification），而鲜少措意“沟通”与“效度”（validity）的问题。典型的示例，便是克莉斯娃（Julia Kristeva）的文本观。^④他们但求其异而略其同，似乎遗忘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长久以来的教诲：莫让语言对我们的智力产生迷惑。^⑤完全自足的文本论就仿佛“缸中之脑”（brains in a vat）无所指涉（non-referentiality），因此就不具有任何经验的意义。^⑥

晚近语言哲学的探讨复指出，“语言”得以指涉实在（reality）乃吾人知晓任何语言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⑦是故，在“语言转向”后，即激起一股返归经验的浪潮，他们固然承认语言的媒介作用，但坚持“经验的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⑧毋怪晚近的“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不少人出自重视“硬事实”（hard facts）的马克思阵营。^⑨也因此，后现代史学只能着力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言说层面，而难以逾越雷池（若经济史）半步。

况且，后现代史学经常陷入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们攻讦“后设叙述”，另一方面在分期上，他们却口口声声断定当前正由“现代主义”迈入“后现代主义”，这难脱“后设叙述”之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特说得对：过去原为杂乱无章的数据（data），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而史书的叙述轮廓悉由史家所施加。^⑩换言之，历史的叙述总是因时制宜的权宜之计，故只要符合实情，大、小叙述皆宜。若由实在论出发，则叙述之大小固与实存经验攸关，非全由

① *History*,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 1973, p.137. 唯进入 20 世纪，兰克的史学精神频受质疑。

① Ernst Breisach, *On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Postmodernist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53-165.

② Ihab Hassan, “Making Sense,” in *The Postmodern Tur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02.

③ Hayden White, “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65.

④ 参见 Julia Kristeva, “Prolegomena to the Concept of ‘Text’,” in Denis Hollier and Jeffrey Mehlman, eds., *Literary Debate: Texts and Context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pp. 303-304.

⑤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58, p.109.

⑥ “缸中之脑”为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著名的“思想实验”，道出经验知识的产出必须仰赖指涉外在的实质脉络。Hilary Putnam, “Brains in a Vat,” in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21.

⑦ 例如普特南、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参见 Antony Easthope, “Postmodernism and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in Stuart Sim, ed., *The Routledge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stmodern Thought*, US: Routledge, 2001, p. 24.

⑧ 例如 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no. 4, October 1987, pp. 905-906. 比较理论的陈述则见 C. Behan McCullagh, *The Truth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43.

⑨ 参见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John O'Neill, *The Povert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⑩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 258-262.

史家片面所能决定。^① 套句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的说词, 后现代主义, 说穿了, 也只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② 自然有其局限。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复曾经如此开示过: “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③

总之, 后现代主义虽有其偏颇之处, 但绝非一无是处, 譬如它能激发史家的省思, 重新去思考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联; 再者, 在开发新的史学领域尤功不可没; 例如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 其开发历史议题的能量 (诸如医疗史、法政史、心理史等), 无人可望其项背; 连他的敌对者都不得不称赞他乃是近三十年社会史的泰山北斗。是故, 不可一概抹煞。至于中国新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究竟又是一次短暂的流行际遇, 或则会散叶开花, 留下较恒久的结果, 吾人则可拭目以待。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概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彭 刚

在一篇文章中, 我曾区分过广义的和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④ 概言之, 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 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所产生的冲击和效应。比如, 对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自由”、“进步”、“阶级冲突”为主线来解释人类历史过程的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的拒斥, 导致历史学的“碎片化”。又比如,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权力分析, 让人们更加关注权力关系在历史话语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则在不遗余力地攻击以“白的、男的、死了的”为中心的历史图式和经典谱系的同时, 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改变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视角等。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 则指植根于历史学内部、而在史学理论这一专门学科领域内产生的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取向和色彩的理论范式。可以说, 以 1973 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问世为标志而正式登场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⑤ 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于史学理论这一专门领域的主要理论形态。本文拟就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论取向、问题意识和政治蕴含稍作梳理和辨析。

一、理论取向: “文本化”与“历史实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在历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这一场学术范式的转换, 通常被称为

① David Carr, “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d “Getting the Story Straight,” in 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chs. 9 & 12.

②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吴美真译,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 1998 年。

③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South Bend, Indiana: Gateway Editions, Ltd., 1967, pp. 60-61.

④ 参见彭刚: 《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 《史学理论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⑤ 安克斯密特在其《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一文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中, 详尽地梳理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由微而显的学术史脉络。